

從滿文媒介看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之流通

孔 令 偉*

摘 要

十七世紀滿洲人的崛起以及清朝入主中國，深刻影響東亞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發展。在此歷史背景下，清朝相關資訊開始發生國際傳播，並吸引日本德川幕府與江戶知識人的關注。值得注意的是，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流通的過程中，滿洲語文曾作為傳播媒介發揮關鍵作用。幕府曾經由粗通滿語之日本漂流民，得知 1644 年滿洲入主中國前後的情況，後續促成日本對清代中國資訊的求索。享保年間（1716-1736）幕府解讀清朝情報與破譯滿文文字的嘗試，形塑當時日本對中國之外交政策。十七世紀後期以降，來自清朝的滿文文書經由長崎以及山丹貿易傳入日本，促成德川幕府通過解讀滿文進一步認識清代中國，進而為江戶知識人以漢學以及蘭學方法從事滿洲語學研究奠定基礎。藉由探討以上議題，本文聚焦清朝相關資訊在江戶日本流通過程中，滿文資訊來源所發揮之作用。從揭櫫清帝國內亞性的滿洲史料切入，本文探討清朝相關資訊如何陸續通過以釜山、長崎乃至庫頁島等地的海外貿易網絡與日本產生交流，進而對形塑近世東北亞乃至世界史格局，所發揮之重大影響。

關鍵詞：滿文資料、清代中國、江戶日本、朝鮮韓國、資訊流通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Qing Dynasty in Edo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nchu Media

Kung, Ling-wei*

Abstrac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rise of the Manchus and the Qing conquest of China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 In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information about the Qing dynasty started to be disseminated internationally,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In Edo Japan, the Manchu languag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Qing. Via Japanese castaways who possessed basic Manchu knowledge, the Shogunate was able to collect intelligence about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Manchu conquest of 1644. The intelligence provided by the castaways initiated Japan's quest for information about Qing China. During the Kyōhō era (1716-1736), the Shogunate's attempts to access information about the Qing and decipher the Manchu script shap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fter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chu documents from the Qing were imported to Japan via the Nagasaki and Santan trading networks. The circulation of Manchu sources helped the Tokugawa Shogunate deepen its understanding of Qing China and prompted Edo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o study Manchu through kangaku (Chinese learning) and rangaku (Dutch learning) methods. Probing into the above issu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irculation of Qing-related information in Edo Japan. Focusing on Manchu sources that embody the Inner Asian dimension of the Qing empire, this work sheds light on th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etween Qing China and Edo Japan through overseas trade networks centered in Busan, Nagasaki and the Sakhalin Island.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in Manchu in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Northeast Asian and world history.

Keywords: Manchu sources, Qing China, Edo Japan, Joseon Korea,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壹、前言

作為東亞史上兩大重要文明，中國與日本的交往可謂淵源流長。自公元七世紀以降，日本派遣使者訪問隋唐，¹其後雙方歷代交流，時有興替起伏，然綿延不絕。²自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之間，隨著東北亞、中央歐亞乃至世界史的連動發展，推動了國際以至於洲際之間的跨地域整合，故學界視之為早期現代世界（early modern world）之歷史進程。在這段期間，清代中國與江戶日本雙方曾經有過多元的文化交流，其中資訊傳遞與知識流通，尤為豐富。就制度面而言，雖然十七至十九世紀之間，清廷曾多次申明海禁之令，日本方面亦數度頒布鎖國令，然而實際上這段期間清朝與日本雙方，仍然通過福州、乍浦、長崎等口岸，保持著物質、經濟乃至文化思想層面上的交流。不僅如此，德川幕府雖然對於國際貿易，採取一定的限制規範；但與此同時，幕府自身出於軍事與外交需求的考量，曾積極探求關於清代中國的相關情報，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日本對中國之認識。³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在於從滿文史料出發，梳理清朝入關前後滿洲與日本雙方的彼此認識，進而探討情報搜集、書籍流通、滿文譯解等具體歷史議題，為溝通內亞史、海洋史及國際史的多元史觀提供實證參照。

有賴先行研究之積累與發展，國際學界得從東亞海域史、中日關係史的研究視角，深化對清代中國與江戶日本交往之認識。⁴另一方面，在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思潮的帶動下，亦有學人著手探討大清帝國在其中原與內亞統治基

¹ 古瀬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東京：吉川弘文館，2018）。

² 大庭脩、王曉秋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³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

⁴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東京：創文社，1987）；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16）；劉序楓，〈清康熙年間の日本調査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故宮學術季刊》，第 39 卷第 4 期（2022），頁 123-171；徐興慶，〈長崎港與近世中國文化之受容〉，《海港都市研究》，第 1 編（2006），頁 21-32；沈玉慧，〈從對日情報蒐集與運用分析清朝對日政策〉，劉序楓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143-178；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2021）；仲光亮，《日本江戸幕府蒐集中國情報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7）；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14）。

礎之外，所體現之多元海洋屬性，從而提出所謂新清海洋史（New Qing Maritime History）的觀點。⁵ 此外，近年來亦有研究者從全球史以及知識史的角度出發，運用多語種史料探討作為清朝資訊載體的滿文，如何推動近世歐亞大陸各地間的國際知識交流。⁶ 綜合上述先行研究之思路，本文從具有內亞（Inner Asia）屬性的滿文文獻出發，觀照雙方經由釜山、長崎以及庫頁島等諸海域貿易，所展開之情報搜集等國際活動，進而研究大清帝國與江戶日本之間資訊傳遞與知識流通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滿文所扮演之關鍵媒體角色；以期從內亞與海洋史觀重新探索清、日對彼此的認知經過，並進一步研究當時內亞與海洋世界間的知識交流。本文重點闡釋滿洲語文係日本認識清朝之重要媒介，其承載之資訊深刻體現十七世紀以降清、日雙方對東北亞地緣政治發展之理解。與此同時，通過對滿洲語文相關知識的求索，不僅促成江戶日本對清代中國的知識建構，更進一步推進日本知識人對滿洲語學的研究，從而在思想與文化等清、日交流層面上，發揮重大意義；於早期現代東亞世界的跨地域性整合，更有著深遠的影響。

貳、德川幕府對清朝入關之認識

十七世紀初建州女真在努爾哈齊（1559-1626）的帶領下迅速興起，逐步兼併女真各部，於天命元年（1616）建立金國（aisin gurun），成為雄踞遼東的武裝勢力。其後皇太極（1592-1643）更是先後在天聰九年（1635）改族名女真（jušen）為滿洲（manju），於崇德元年（1636）建國號為大清（daicing），與明朝分庭抗禮，成為東北亞一大政治力量。⁷ 隨著順治元年（1644）滿洲入主中國，歐亞大陸東部的地緣政治發生鉅變，而清朝、朝鮮以及日本之間的資訊往來，亦因海外貿易以及漂流民議題的發展，日益頻繁。有清順治朝方面，因與朝鮮之宗藩關

⁵ Ronald C. Po,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盧正恒,〈賊謀四出廣招徠：鄭氏謀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第26卷第1期（2019），頁1-58。

⁶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孔令偉,〈1724-1768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第2期（2018），頁27-48；孔令偉,〈日本、日耳曼的滿語文研究與近世歐亞〉，《讀書》，第5期（2019），頁160-170。

⁷ 黃彰健,〈滿洲國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下冊（1967），頁459-473。

係，持續獲得關於日本之資訊。滿洲入關以前已曾經由朝鮮獲得日本相關情報，⁸至順治朝則持續對日本保持關注，尤其留意其武裝活動與軍事水平，日本武士使用之倭刀，便是其中一例。順治元年元旦，朝鮮國王「李倧又於歲貢外，獻所獲倭刀等物」。⁹在順治帝（1638-1661）從朝鮮收到日本武士刀後不久，滿洲人更與日本漂流民發生直接接觸。

日本寬永二十一年（1644），竹內藤右衛門（生卒年不詳）等五十八名商人從越前國三國港（位於今日本福井縣坂井市）出發，順著黑潮沿著日本海東側一路向北航行，前去越後（今新潟縣）進行貿易。不料航向偏離而漂流至摩闊崙（今俄羅斯遠東聯邦濱海省波西耶特市）一帶，被居住在圖們江流域濱海地帶的野人女真發現。起初雙方並無衝突，然日本商人見到野人女真攜來人參，欲詢問採參地點，反而引起懷疑，終被引入森林誘殺。朝鮮方面當時亦曾獲得相關情報，《李朝實錄》載：

北兵使成夏宗馳啓曰：「也春住胡得春來言，于慶興府使金汝水曰：『所乙古等胡人百餘到海邊，則倭船三艘，漂風而至，言語雖不相通，而其所幹，專為採蔘。所乙古等佯若指示蔘處，誘殺六十餘人，生擒十五人，燒其一船，以所擒倭人及若干銃、劍等物，將獻于瀋陽。』云。」¹⁰

倖存十五位日本商人，連同所獲日本銃、劍諸物，被野人女真以戰利品的形式送往盛京進獻。隨著同年清廷中央入關南遷，這些日本商人亦被轉移至北京安置，並且曾與多爾袞（1612-1650）等滿洲官員發生接觸，因此不僅得以親見明清鼎革之際中國之情況，同時更習得基本滿語知識。¹¹最終這批日本商人在清廷的幫助下，於順治二年（1645）被批准經由朝鮮返回日本。當時清朝甫定中原，對於日本等鄰國採取交好的態度，故不僅向漂流民「周給衣糧」，並令朝鮮備船將其「轉

⁸ 薛明，〈清入關前的對日認識〉，《清史研究》，第2期（2012），頁43-54；陳波，〈清朝與日本之間的情報搜集——以清朝入關前後為中心〉，《江海學刊》，2014年第4期（2014），頁147-155。

⁹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3，順治元年一月一日，頁41。

¹⁰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卷45，仁祖二十二年七月九日，頁37。按：據下引《靉靉漂流記》記載，被害日本商人實際應為四十三位，而非《李朝實錄》所謂六十餘位。

¹¹ 園田一龜編，《靉靉漂流記》（東京：平凡社，1991）。

送還鄉」。¹²

與此同時，在福州擁立唐王朱聿鍵（1602-1646）即帝位的鄭芝龍（1604-1661），亦試圖代表南明請求江戶幕府援兵對抗滿洲人，遂連續於南明隆武元年（1645）、二年（1646）遣使德川家光（1604-1651）乞師日本。¹³ 另一方面，十五位由清朝遣返之漂流民，亦隨後經由對馬返抵日本大阪。在如此背景下，江戶幕府召來這些從中國返回之漂流民，向其訊問關於清朝之情報。¹⁴ 其中名為國田兵右衛門（生卒年不詳）、宇野與三郎（生卒年不詳）的兩人，因能通曉滿語，將其旅行遼東以及北京的沿途見聞通過口述記錄下來，從而形成《韃靼漂流記》（又名《韃靼物語》）。¹⁵ 該書末尾收錄約六十餘個滿、漢文詞彙，並以日文表音以及釋義。除了數字、動物、飲食等涉及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層面的滿語詞彙外，此書亦介紹與滿洲軍政相關之用語。如其以日文「あばん」音寫滿語 *amban*，即大臣、官員之謂，清人多作「諮班」、「昂邦」，¹⁶ 並將其理解為日文脈絡下的「大名」。¹⁷ 由此可見，這些日本漂流民曾試圖根據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將滿語脈絡中的清朝大臣，比擬為日本幕府體制下的大名。此外，漂流民又分別以日語「もうれ」（滿 *morin*）、「ふり」（滿 *beri*）、「によろ」（滿 *niru*）以及「がふた」（滿 *gabta-*）記下滿語中表達「馬」、「弓」、「矢」以及「射箭」等騎射相關詞彙。¹⁸ 考量《韃靼漂流記》所錄滿語詞彙，係應幕府要求所記，故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當時日本官方對清朝資訊之求索。

根據漂流民所提供之清朝情報，江戶幕府內部曾對是否發兵援助南明，有過多次討論，甚至出現假道朝鮮攻擊滿洲人的議論。朝鮮仁祖二十四年（1646），對馬藩使者以感謝朝鮮先前協助送還漂流民為由前往釜山倭館，卻意外向朝鮮官員透露幕府曾根據漂流民情報考慮攻打清朝的消息：

¹² 《清實錄》，卷 21，順治二年十一月一日，頁 186。

¹³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6）。

¹⁴ 池田皓，《漂民の記録：極限下の人間ドラマ》（東京：講談社，1969），頁 195-196。

¹⁵ （日）國田兵右衛門、宇野與三郎，《韃靼物語》（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天明七年（1787）抄本）。

¹⁶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3，頁 55。

¹⁷ （日）國田兵右衛門、宇野與三郎，《韃靼物語》，頁 24-b；園田一龜，《韃靼漂流記の研究》（奉天：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39），頁 34、302。

¹⁸ （日）國田兵右衛門、宇野與三郎，《韃靼物語》，頁 24。

倭使橘成稅、藤智繩到東萊府，蓋為漂倭押還回謝事也。智繩謂東萊府使閔應協曰：「江戸執政等聞漂倭入來，驚曰：『撻鞞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誇大，而朝鮮受而送之，必是與撻為一也。』」大納言（原注小字：官名。即關白叔父云。）欲赴援南京，議者曰：『彼兵不下百萬，我雖發百萬之衆，平原廣野則必不能抵當，不如假途朝鮮。』島主言：『頃年朝鮮酷被撻兵之禍，人民死亡殆盡，且自釜山至北京八千餘里，決不可輕舉大衆。』以此意，反覆周旋云。」¹⁹

根據藤智繩（生卒年不詳）等日本來使所言，以松平信綱（1596-1662）為首的幕府老中對於滿洲人定鼎北京感到震驚，並將清朝通過朝鮮送還漂流民視為耀武揚威之舉，並推斷朝鮮已經歸順清朝。而時任權大納言的德川義直（1601-1650）支持出兵攻打南京，然而議者以清軍軍勢浩大，就戰略上應假道朝鮮進攻。值得注意的是，對馬藩主宗義成（1604-1657）則推算「自釜山至北京八千餘里」，而反對假道朝鮮之議。

此後日本不斷向朝鮮打探清朝之情報，並試探假道攻清之可能性。藤智繩甚至書送小紙，故意向朝鮮譯官透漏幕府將軍德川家光欲假朝鮮進兵清朝之言：「軍糧不必藉賴於朝鮮，當自我國船運。隣國之道，豈以假道為憚？」²⁰ 由於幕府對於朝鮮是否已歸附清朝一事，頗為介懷，德川家光復於正保四年（1647）經由藤智繩等對馬藩使者詢問朝鮮：「以漂民之事言之，則清國送于朝鮮，朝鮮轉送于我國，朝鮮與清國，果非相好而然耶？大明時，朝鮮為藩邦。即今貴國之於清國，亦如是耶？」²¹ 藤智繩屢屢欲刺探清朝情報，甚至多次出言不遜要求假道攻清，因此與朝鮮官員發生衝突。對此朝鮮方面記載：「差倭藤智繩等三輩狎至，以偵知清虜事情為辭，飾詐虛喝，朝廷駭懼。」²² 此後雙方屢屢爆發衝突，甚至出現日本使者毆打朝鮮官員的情況。順治七年（1650）朝鮮孝宗李淏（1619-1659）遣使

¹⁹ 《朝鮮王朝實錄》，卷 47，仁祖二十四年十一月九日，頁 70。

²⁰ 《朝鮮王朝實錄》，卷 47，仁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頁 74。

²¹ 《朝鮮王朝實錄》，卷 48，仁祖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頁 9。

²² （朝鮮）崔益鉉，〈執義贈吏曹參議芝浦郭公墓碣銘并序〉，收入崔益鉉，《勉菴先生文集》，第 15 冊（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卷 30，頁 25。

謝封，並向順治帝提及日本之潛在威脅：

據議政府報云：「倭子情形可畏，去年秋間，鞭撻使臣，出言不遜。驛館倭使，常以密書示通事，言辭甚謬。我國每年所與糧米，前皆運至屯中，今堆積驛館，似有所待。」又云：「伊國叛賊，雜入漢商船內，出沒沿海地方。遣使我國，言洋船若漂至，即行執送。今有漢人船漂至，不送於咫尺倭館，直為解送上國。其蓄憾於我，比前必甚。前後事端，已成間隙。綢繆之計，不可不早」等語……今欲修築訓練，以為守禦之備，因前有旨禁止，不敢專擅。²³

自丁丑議和後，清廷禁止朝鮮修築城堡等防禦工事。李淔即位後，一方面以日本使者威脅為由，另一方面聲稱日本試圖將混有日本浪人的漢人商船送往中國，以此試圖向清朝請求准許朝鮮修築堡壘以抵禦日本潛在威脅。朝鮮方面原以為清廷對於日本奸細潛入中國頗為忌憚，故以此為外交辭令，未料順治帝反而認為朝鮮修城一事居心叵測，斥責朝鮮國王：「向曾有漂到倭船，朕心惻然，不忍拘留，尚且付爾國送還。爾今欲以所獲漢人船隻，不送我國，而送倭館。又欲修築訓練，此皆亂臣所出之言也。」²⁴ 最後清朝派遣使者前往朝鮮訪查，認為「倭國、朝鮮，素相和好，並無怨亂兵戈之事」，²⁵徹底否定日本入侵朝鮮的可能性。

順治年間竹內藤右衛門等越前商人的漂流民事件，為江戶日本得知明清鼎革之際的中國情報，提供第一手之資訊。出於幕府對滿洲人軍政實力的探求，倖存返回日本之漂流民遂以日語口述關於官名以及騎射之滿文詞彙，從而保存在《韃靼漂流記》中。與此同時，隨著南明鄭氏的日本乞師活動，這些與軍政相關的滿文詞彙傳入日本，亦與之後幕府內部對於「假道朝鮮」攻打中國的議論，有所關聯。而十七世紀漂流民所引介之滿文詞彙，更成為十八世紀江戶滿語文研究之先河。

參、滿文研究在江戶日本之興起

²³ 《清實錄》，卷 47，順治七年一月十一日，頁 376-377。

²⁴ 《清實錄》，卷 47，順治七年一月二十八日，頁 378。

²⁵ 《清實錄》，卷 49，順治七年七月二十日，頁 395。

如前所述，滿洲人定鼎北京這一重大事件，曾對幕府的對外戰略造成相當影響。不僅如此，清朝入主中國後出版大量滿文書籍，更曾促成日本與朝鮮對滿語文知識的研究。隨著十七世紀後期滿文字書以刻本形式大量的印刷出版，滿文知識也在中國境內獲得流通，並進一步通過國際書籍貿易傳往海外，因而促成十八世紀江戶日本的滿語文研究。²⁶ 至於清朝資訊以及滿文書籍輸往日本的緣起，與清朝前期海禁政策的張弛有關。康熙初年，清廷由於顧忌臺灣鄭氏政權，故嚴申海禁。康熙二十年（1681）福建巡撫吳興祚（1632-1698）題請「應令西洋、東洋、日本等國出洋貿易，以便收稅」，康熙帝（1654-1722）則認為「海寇未靖，舡隻不宜出洋」，故不准行。²⁷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臺灣後，海禁政策獲得進一步的放寬，遂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准許開海貿易，²⁸隨後清廷亦設立海關以管理對外貿易稅收。²⁹

康熙帝之所以開海貿易，背後有諸多考量，其中日本的勢力亦是關鍵因素之一。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曾謂大學士伊桑阿（1637-1703）：

朕南巡時，見沿途設有臺座，問地方官及村庄耆老，據云明季備倭所築。明朝末年，日本來貿易，大船停泊，乘小船登岸，直至湖州。原非為劫掠而來，乃被在內官兵殺盡，未曾放出一人。從此，釁端滋長，設兵防備，遂無寧靜。³⁰

可見康熙帝二次南巡江浙一帶，曾從當地人口中得知晚明倭寇之患，實肇因於對日本貿易之阻撓。故其後雖有官員輒以海盜為由請復海禁，康熙帝卻對海外貿易保持相對開放之態度：「朕意沿海居民，俱賴往日本國貿易為生，若行禁止，於民甚屬無益。」³¹ 在這樣的態度下，其後日本於正德五年（1715）頒發正德新例，規定來自中國的唐船商人須持日本年號信牌方得互市，此事雖一度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引起清廷內部之注意，甚而致使所謂的信牌事件；惟康熙帝在秘密派

²⁶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97-120.

²⁷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康熙二十年一月三十日，頁 657。

²⁸ 《清實錄》，卷 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一日，頁 205、212。

²⁹ 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陳國棟，〈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貿易的形成〉，《大陸雜誌》，第 64 卷第 2 期（1982），頁 21-35。

³⁰ 《康熙起居注》，卷 25，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頁 1895。

³¹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頁 1559-1560。

員前往日本調查後，最終評估日本並無威脅，決定默許此案，繼續維持開放商人前往長崎貿易。³² 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方面雖在原則上禁止書籍出口海外，然而隨著對日貿易的發展，不少書籍以及相關情報亦經由走私輸入日本，其中滿洲語文亦作為理解清朝的重要資訊管道，而為幕府所關注。

信牌事件發生不久，第八代幕府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於享保元年（1716）繼位，其主政期間曾推行一系列政治、文化與經濟革新，史家名之為享保改革。德川吉宗任用室鳩巢（1658-1734）、荻生徂徠（1666-1728）、荻生北溪（1673-1754）等學者，並放寬禁書令，從而促成江戶日本的文化與思想得到相當發展。³³ 與此同時，德川吉宗有意學習中國經驗，用以作為日本軍政制度改革之參考，因此幕府曾通過長崎的唐船商人，購得為數可觀的清朝書籍。³⁴ 幕府在取得這些來自中國的出版物後，曾召集學者研究清朝的典章制度。如 1720 年代，德川吉宗曾委託儒學者荻生北溪與深見有鄰（1691-1773）研究康熙《大清會典》之漢文本，試圖將其中部分內容進行日文翻譯，希望藉此理解清朝官制。³⁵ 然因為《大清會典》等書中所收之清朝官銜，多有滿語相關之專有名詞，因此在缺乏滿文知識的情況下，荻生北溪與深見有鄰等日本學者雖嫻熟漢文經典，卻無法充分理解滿語相關之清朝職官名銜。³⁶

為進一步破譯清朝情報，幕府在延攬日本儒學者的同時，亦試圖借重清朝線人的幫助。在幕府的邀請下，一位名叫朱佩章（生卒年不詳）的福建人曾於享保十年（1725）、十一年（1726）兩次往渡長崎，從而為江戶日本解讀清朝情報提供關鍵助益。³⁷ 期間在德川吉宗的同意下，由居住在江戶的荻生北溪統整幕府關於清朝情報之疑問，隨後寄往駐留在長崎的深見有鄰。深見有鄰的祖父深見久兵衛（漢名高大誦，1603-?）乃原籍福建的日本唐人，並曾在長崎任通事多年。由於

³² 劉序楓，〈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頁 130；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354-390。

³³ 大石学，〈吉宗と享保の改革〉（東京：東京堂，2001）。

³⁴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

³⁵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233-245。

³⁶ 楠木賢道著、阿拉騰譯，〈江戸時代享保年間日本有關清朝及滿語研究〉，《滿語研究》，第 1 期（2013），頁 76。

³⁷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頁 479。

其地緣以及文化背景，最後由深見有鄰代表幕府向朱佩章當面提出諮詢，最終以問答形式記成《清朝探事》。³⁸ 根據《清朝探事》的紀錄，可知荻生北溪曾代表幕府向朱佩章詢問關於滿語官職之詞源及語意，這體現出日本學者當時譯解《大清會典》所面臨之難題。³⁹ 此外，朱佩章因早年投身行伍，曾遊歷中國各地，故在日本方面要求下自述見聞，書成題為《朱佩章偶記》，其中記載亦為日本解讀清朝滿語官職提供參考。如《朱佩章偶記》載：「內廷包衣昂邦四員，分鑲黃旗兩員，正黃旗一員，正白旗一員。包衣昂邦者，漢語係家裏總管大臣也……黑撥大人數員，黑撥者，漢話議政也。」⁴⁰ 此處朱佩章明確提及清朝總管內務府大臣的制度員額以及滿文名稱「包衣昂邦」(booi amban)，並以漢語「家裏」詮釋滿語「包衣」(booi, 家的)，進而將「包衣昂邦」直譯作「家裏總管大臣」。此外，朱佩章所謂「黑撥大人」，即滿語議政大臣(hebei amban)，並為助於日本理解，將「黑撥」(hebei)釋為漢語「議政」，由此可見他略曉滿語。

在滿語官銜釋義外，朱佩章首次造訪長崎時，幕府曾試圖向他打聽滿洲人的養馬與騎射技術，但朱佩章本人對此並不熟悉。朱佩章在給幕府的呈文中提及：

前蒙欽問，款內現有不能詳知者，間或有之，更有養馬、療馬等事，甚不知詳，深為慙愧。回唐之日，所承欽問之事，逐一查考，詳細具能，有騎馬、養馬、療馬之人，擇其善者，帶同前來，以備欽問。⁴¹

享保十一年(1726)年底朱佩章二度抵達長崎後，幾經波折，最終突破清朝禁令，招徠擅騎射的武人於翌年冒名赴日，⁴²幕府因此得以向他們詢問清朝養馬與騎射之相關知識，從而在問答基礎上形成《唐馬乘方聞書》、《唐馬乘方補遺》、《對語驥錄》等著作。⁴³ 幕府對於清朝馬術的興趣，又再次呼應先前《韃靼漂流記》中對滿語騎射類詞彙的記述。

³⁸ (日)荻生總七郎、(清)朱佩章，《清朝探事》(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

³⁹ 楠木賢道著、阿拉騰譯，〈江戶時代享保年間日本有關清朝及滿語研究〉，頁77-80。

⁴⁰ (清)朱佩章，《朱佩章偶記》(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頁5。

⁴¹ (日)林復齋，《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2)，第5冊，卷216，頁466。

⁴² 大庭脩，《江戶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第8章。

⁴³ 《唐馬乘方聞書》；《唐馬乘方補遺》；《對語驥錄》(均收入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二：朱氏三兄弟集》，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95)。

除荻生北溪、深見有鄰等人外，亦有其他日本學者關注滿洲語文的相關知識，如荻生北溪的胞兄、儒家者荻生徂徠編有《滿字考》一書，其中收錄滿文十二字頭以及漢字注音，主要目的在於用聲韻學的反切方法，考證滿文字母之拼讀及其漢字對音。⁴⁴ 其編纂邏輯，主要是自左向右依序橫列滿文「a、e、i、o、u、ū」等元音，逐漸增減「n、k/g、b/p、s、t/d、l、c、j/y、g/h」等字首輔音；另一方面自上而下以豎行形式疊加「i、r、n、ng、k、s、t、b、o、l、m」等字尾韻腳，共計 131 種音節組合，屬於典型清代十二字頭的滿文教學法。⁴⁵ 荻生徂徠在《滿字考》跋文中，曾自述其滿文知識之來源：

物子（按：徂徠本物部氏）曰：右十二字頭，乃《正字通》卷首所載，祇字體頗似訛，今校以尤珍《清書千字文》，橫列為圖，而其字腳朱書，以便觀覽。間有缺漢字者，則以《千字文》補填；其漢字少有不同者，錄其側，皆朱書以別。原文又有〈十二字頭訣〉，載不盡者，則載于左。⁴⁶

根據上引跋文，可以得知荻生徂徠編纂《滿字考》的依據，主要是比較《正字通》以及《清書千字文》這兩本書籍所錄滿文字母。《正字通》原為明末張自烈（1597-1673）所作，入清以後由其友廖文英（生卒年不詳）刊刻，並於卷首增附其子廖綸璣（生卒年不詳）所編滿文〈十二字頭〉以及〈十二字頭引〉。⁴⁷ 在以《正字通》卷首所附滿文十二字頭為基礎的同時，荻生徂徠又進一步比對清廷翰林院編修尤珍（1647-1721）所作《清書千字文》。⁴⁸ 由此可見，隨著當時清、日貿易之推進，身處十八世紀初期日本的荻生徂徠已能得見相關滿文字書，進而消化吸收而纂成《滿字考》；而江戶滿洲語學的興起，也在相當程度上體現清朝同文思想與開海政策的外部效益。

⁴⁴ （日）荻生徂徠，《滿字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日）荻生徂徠，《滿字考》（收入南畝子輯《群書一轍》，第3冊，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日本天明元年（1781）抄本）。此書歷史背景，參見：上原久，〈「滿字考」について〉，《埼玉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篇》，第37編（1988），頁1-9；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90-95.

⁴⁵ 馬騰，〈「十二字頭」與清代滿文語學〉，《清史研究》，第3期（2014），頁1-11。

⁴⁶ （日）荻生徂徠，《滿字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頁13。

⁴⁷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輯，《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楊義騰，〈《正字通》與歷代重要字書之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3），頁69-80。

⁴⁸ （清）尤珍，《清書千字文》（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寫本）；（清）尤珍，《清書千字文》（收入汪嘯尹纂輯，孫呂吉參註，《千字文註》，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日本正德五年（1715）和刻本）。

肆、賞烏林、山丹交易與滿文文書

除了長崎的唐船貿易外，清、日雙方的資訊流通，亦體現在雙方經由庫頁島的愛伊努人與黑龍江下游土著民之間的貿易活動，其中滿文亦再次發揮關鍵的作用。十七世紀清朝興起後，於順治、康熙年間先後對居住在松花江與黑龍江流域的赫哲、費雅喀人進行招撫編戶，並對其進行賞烏林（*ulin šangna-*，意即賞財物）；即由赫哲、費雅喀人向清廷貢獻貂皮等土產，清廷則賞賜衣物、工藝品等財物作為回賞。⁴⁹ 隨著賞烏林的制度化，清朝於黑龍江下游處沿岸建立木城，作為夏季與當地土著民進行賞賜之行署，而庫頁島的愛伊努人亦以領賞為名，渡海前來與清朝進行經濟交換。另一方面，自十七世紀下半葉，日本松前藩（今北海道松前郡）亦通過庫頁島的愛伊努人與黑龍江下游的土著民進行經濟交換，即日本史學界稱山丹交易。⁵⁰ 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與日本曾分別通過與愛伊努人進行賞烏林與山丹交易，獲得關於彼此之資訊。

在與清朝交往的過程中，愛伊努人曾透漏與日本山丹交易之情報。因愛伊努人慣呼日本為「西散」（*sisam*），即「外國人」之意，⁵¹而愛伊努語對日本人的特殊稱謂，也經由黑龍江下游的賞烏林活動為清朝所知。雍正七年（1729），寧古塔副都統常德（*Cangde*，生卒年不詳）曾派遣通費雅喀語的驍騎校伊布格訥（*Ibgene*，生卒年不詳）前往位於東海之島的西散國打聽情報，並且尋取該地出產之物，與之貿易。西散國之名，以因此見於《軍機處奏摺錄副》以及《三姓副都統衙門檔案》等清代滿文公文書中。⁵² 此後，清朝曾試圖持續打探關於西散國之

⁴⁹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關嘉祿、佟永功，〈清朝貢貂賞烏林制度的確立及演變〉，《歷史檔案》，1986年第3期（1986），頁93-98；賴惠敏，〈清代烏梁海的貢貂與商貿活動〉，《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9），頁9-17；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2006）；Jonathan Schlesinger,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9-166.

⁵⁰ 佐々木史郎，〈18、19世紀におけるアムール川下流域の住民の交易活動〉，《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第22卷第4號（1998），頁683-763；Brett L. Walker, *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Japanese Expansion, 1590-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41; Brett L. Walker, "Reappraising the Sakoku Paradigm: The Ezo Trade and the Extension of Tokugawa Political Space into Hokkaido,"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0, no. 2 (1996): 169-192.

⁵¹ Alexander Vovin, *A Reconstruction of Proto-Ainu* (Leiden: E.J. Brill, 1993), 137.

⁵² 遼寧省檔案館譯編，《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瀋書社，1984），頁132；松浦茂，

情報，嘉慶二十三年（1818）佐領付勒渾（Fulehun，生卒年不詳）等人代表清朝前往位於黑龍江下游的滿洲行署德楞木城（今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青年城下游之 Novoil'inovka 一帶），與自庫頁島前來的愛伊努人進行賞烏林，惟其中陶（Too）氏族的哈賚達（halai da，部長）多年未曾親到，而是委託他部憑滿文劄付領賞。付勒渾等人因此試圖囑咐其他愛伊努部長聯繫陶氏，並修漢文書一封，稱：「耳聞西散大國與陶姓人往來見面，是以煩勞貴官，如遇陶姓人切示曉諭。令伊明年六月中旬前來領賞，如不抵至，即將此姓人銷除，永不恩賞。」⁵³ 可見當時陶氏愛伊努人與西散國交往，卻不來領取賞烏林，清朝官員對此頗為介意。對此與清朝方面交好的楊氏（Yadan）愛伊努人，很可能為撇清與日本之關係，遂向清朝輸誠並回報：「耳聞西散大國原因（由），並未知情。」⁵⁴

另一方面，愛伊努人在與清朝的交往過程中，曾領取官方頒發之滿文文書；而伴隨著山丹貿易的發展，日本方面亦開始關注這些當時保存在庫頁島上的滿文檔案。現存北海道大學圖書館藏《樺太名寄惣乙名文書》收有乾隆四十年（1775）三姓都統衙門給愛伊努楊氏部族之滿文文書，內稱為免其感染天花，暫緩前往北京朝貢一事。⁵⁵ 日本寬政四年（1792），江戶探險家最上德內（1755-1836）抵達庫頁島時，曾在愛伊努楊氏部長處見到前述乾隆四十年之滿文文書，並抄寫一份帶回日本。⁵⁶ 此後日本方面曾對這份來自庫頁島的滿文文件，進行相關釋讀。如曾多次探訪蝦夷地的日本學者近藤重藏（1771-1829）在文化元年（1804）完成之《邊要分界圖考》中，亦抄錄這份乾隆四十年之滿文文書，並對其傳遞過程以及印文內容進行介紹。⁵⁷ 此外，根據《通航一覽》記載，日本文化年間（1804-1818）一位名叫山田右久衛門（生卒年不詳）的松前藩通事，曾破譯這份滿文文書。⁵⁸

除了通過愛伊努人見到滿文文書外，十九世紀初期前往黑龍江流域的日本人

《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 105-106。

⁵³ 《カラフトナヨロ惣乙名文書》（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館藏本），第 3 號。

⁵⁴ 《カラフトナヨロ惣乙名文書》，第 4 號。

⁵⁵ 《カラフトナヨロ惣乙名文書》，第 1 號。

⁵⁶ 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滿州文〉，《北方文化研究》，第 3 編（1968），頁 179-196。

⁵⁷ （日）近藤守重，《邊要分界圖考》（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第 3 冊，頁 17-24。

⁵⁸ （日）林復齋，《通航一覽》，卷 236，頁 42。

更曾與滿洲官員直接會面，並直接獲得滿文書類。日本文化五年至六年間（1808-1809），間宮林藏（1780-1844）兩度前往庫頁島與黑龍江流域進行調查。在其助手村上貞助（1780-1846）的幫忙下，間宮完成《東韃地方紀行》、《北夷分界餘話》等著作，⁵⁹在記錄其實地見聞的同時，當中亦收錄滿文相關資訊。如在《東韃地方紀行》中，間宮林藏提及他在黑龍江下游德楞的滿洲行署，與三名分別名叫沃勒恒阿（Wesihengge, 生卒年不詳）、撥勒渾阿（Bolhongga, 生卒年不詳）與托精阿（Tojingga, 生卒年不詳）的滿洲官員見面。間宮林藏並將其中沃勒恒阿提供的名刺，按原形制抄入書中，上以滿漢文書寫：「大清國正白旗滿洲委著筆帖式魯姓名沃勒恒阿」（“Daicing gurun gulu šanggiyan manju gūsa bithesi nuyele hala gebu wesihengge”）。此外，間宮林藏在沃勒恒阿的漢文人名旁，以日文假名「ベジケが」注明滿文 Wesihengge 之音讀。⁶⁰此外，間宮在《北夷分界餘話》中，再次抄錄了乾隆四十年清朝頒發給愛伊努人的滿文文書。⁶¹

十七世紀後期以降，清、日雙方分別通過與黑龍江與庫頁島一帶的土著民進行賞烏林以及山丹交易等經濟活動，得到關於彼此之情報，而滿文文書在此資訊流通的過程中，曾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通過滿文公文的匯報，清朝方面得知愛伊努人曾與名為西散的國家進行貿易，並曾於雍正年間派員前往當時的松前藩下轄之蝦夷地（今北海道一帶），從而與日本發生接觸。另一方面，隨著清朝勢力通過賞烏林在黑龍江下游地區的延伸，居住在庫頁島上的愛伊努人亦曾領受滿文公文。當十八世紀下半葉日本探險家前往庫頁島與黑龍江一帶調查時，曾屢次留意當地出現之滿文書類，並在返國後將其抄錄之滿文內容收入書籍刊布，從而為江戶日本進一步認識滿洲語文提供基礎資料。

伍、清俄關係與十九世紀日本的滿洲語學

長崎的漢人與庫頁島的愛伊努人提供之滿文資訊，成為江戶日本認識清朝的

⁵⁹ （日）間宮林藏，《東韃地方紀行》（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北夷分界餘話》（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⁶⁰ （日）間宮林藏，《東韃地方紀行》，卷中。

⁶¹ （日）間宮林藏，《北夷分界餘話》，第10冊。

關鍵依據。隨著近世東北亞的地緣政治發展，滿文一度成為清朝、日本與俄羅斯通用的外交語言。1804 年俄羅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 Pavlovich, 1777-1825）派遣列紮諾夫（Nikolai Rezanov, 1764-1807）率領使團經由千島群島抵達日本長崎，試圖與江戶幕府建立經貿往來。該使團雖攜來俄文國書及其滿文與日文譯本，但因俄羅斯人的日譯文水準欠佳、語句不通；而當時幕府中亦無人真正通曉滿文與俄文，⁶²雙方一度陷入無法溝通的尷尬局面。最終由隨行俄羅斯使團的日爾曼裔學者朗斯多夫（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 1774-1852）以荷蘭文溝通，方才舒緩僵局。⁶³然最終幕府與俄羅斯使團的談判破裂，隨後俄羅斯出兵攻打日本，即 1806 至 1807 年的文化露寇事件，卻也意外造成日本方面著手重視滿文外交人才的培養。

列紮諾夫使團之所以在俄、日文外，尚且攜帶國書滿譯本，與當時東北亞的國際政治局面，息息相關。1653 年，沙皇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Aleksey Mikhailovich, 1629-1676）派遣巴依科夫（Fyodor Isakovich Baykov, 1612-1663）出使清廷，⁶⁴該使團於順治十二年（1655）抵達張家口外。清朝方面由理藩院負責接待，並代表皇帝向俄羅斯使團頒發滿文詔書。⁶⁵隨著十七世紀後期清、俄雙方往來頻仍，逐步形成由清朝理藩院以及沙俄樞密院（senat）為視窗的外交機制，其間公文往返則多用滿文。這也造成俄羅斯帝國在處理其遠東事務時，習慣以滿文作為其主要的外交語言之一。⁶⁶隨著十八世紀後期以降俄羅斯通過堪察加半島以及阿拉斯加經營北美貿易網絡，並於 1799 年成立俄美貿易公司（Russian-American Company），俄羅斯在遠東事務上使用滿文的特殊現象，甚至對美國產生一定影

⁶² 松岡雄太，〈『翻譯滿語纂編』と『清文鑑和解』の編纂過程〉，《長崎外大論叢》，第 17 號（2013），頁 61-80。

⁶³ G. H. von Langsdorf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1806, and 1807* (London: Henry Colburn, 1813-1814), 194.

⁶⁴ Erika Monahan, *The Merchants of Siberia: 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55; Gregory Afinogenov,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9-30.

⁶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署理理藩院事務頭等侍衛毛齊塔特等題請令內閣草擬致喀爾喀畢錫勒圖汗俄羅斯沙皇敕諭恭呈預覽本〉，《清朝前期理藩院滿蒙文題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卷 1，頁 109。

⁶⁶ Ling Wei Kung,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etween Early Modern China, Inner Asia, and Eurasia, 1621-191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olumbia, 2021), 349-353.

響。1844 年首位美國全權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造訪清朝並代表美國總統泰勒（John Tyler, 1790-1862）攜來國書。時任兩廣總督耆英（1787-1858）遂奏請道光帝（1782-1850）向美國頒發滿文詔書：

奴才伏查咪喇堅地處西隅，在各國中最為荒遠，今蒙恩准特降詔書……至頒發之時，似宜用清文書寫，更為慎密。且該國人時赴俄羅斯貿易，最重清文，益足動其欽服。⁶⁷

由此足見，滿文一度在俄羅斯對東北亞的國際外交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這也是 1804 年列紮諾夫使團攜帶俄羅斯國書之所以會有滿譯本的歷史背景。

十九世紀初期文化露寇事件前後，日本方面除了軍事上的防備，亦試圖加強培養通曉外國知識以及外語技術的學者和通事；而滿文亦在前述背景下，被列入當時考量之主要外交語言。延續十七世紀以降對中國情報的求索，⁶⁸德川幕府於寬政九年（1797）成立昌平坂學問所，通過長崎輸入之中國書籍研究清朝情報。⁶⁹此外，據《續長崎實錄大成》記載，1808 年英艦輝騰號（HMS Phaeton）事件爆發後，幕府命令長崎的唐通事在漢文外兼學滿文，至於阿蘭陀通詞則在荷蘭文外並習俄文。⁷⁰在如是時空背景下，文化五年（1808）日本蘭學者高橋景保（1785-1829）開始著手研究幕府所藏《御制增訂清文鑑》等清朝傳入日本之滿文字書，用以譯解俄羅斯國書之滿文翻譯，並在文化七年（1810）完成《魯西亞國呈書滿文訓譯強解》（簡稱《滿文強解》）的文本釋讀。⁷¹該書隨後入藏昌平坂學問所，成為幕府日後解讀滿文外交文書之依據。⁷²文化八年（1811）幕府批准高橋景保的建議，於天文方下設立名為蕃書和解御用的翻譯機構，成為幕府中央專責的翻譯機構，並由高橋本人董其事。⁷³

⁶⁷（清）文慶、賈楨、寶鋆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73，頁 29。

⁶⁸大庭脩，《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

⁶⁹眞壁仁，《德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

⁷⁰（日）小原克紹，《続長崎實錄大成》（長崎：長崎文獻社，1974），卷 11，頁 434。

⁷¹（日）高橋景保，《魯西亞國呈書滿文訓訳強解》（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⁷²關於高橋景保生平，參見：新村出，〈高橋景保の滿洲語學〉，收入新村出，《東方言語史叢考》（東京：岩波書店，1927），頁 42-72；上原久，《高橋景保の研究》（東京：講談社，1977）；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97-119.

⁷³Rebekah Clement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其後日本文化十年（1813），俄羅斯伊爾庫茨克總督特列斯金（Nikolai Treskin, 1763-1842）致松前奉行書信滿文兩通，高橋景保旋在同年完成這兩份滿文信件の日譯以及注釋工作，集為一書，題為《俄羅斯國伊爾庫茨克巡撫贈松前奉行滿文書翰解》（下稱《滿文書翰解》），⁷⁴其內容體現滿文作為溝通日、俄關係的重要媒介。隨著文化露寇事件後日俄關係惡化，俄羅斯海軍軍官戈洛夫寧（Vasily Golovnin, 1776-1831）於1811年奉派前往千島群島進行測繪調查，旋於國後島被日本逮捕。為報復日本當局，俄羅斯也隨後抓捕日本海商高田屋嘉兵衛（1769-1827），以此要求幕府交換俘虜。高橋景保譯注《滿文書翰解》的主要內容，即是當時俄羅斯向幕府提出換俘的外交書信。

高橋景保的滿洲語學，起初肇因於日俄現實的政治交涉，然其隨後對滿文的考證研究，卻促成日本漢學與蘭學傳統的匯流，乃至江戶日本地理知識之發展。在譯注《滿文書翰解》的同時，高橋亦曾積累滿文詞彙相關筆記並編輯成冊，如他在文化十年曾編成《滿字隨筆》一本。⁷⁵其中他根據《增訂清文鑑》等清朝字書，抄出一系列滿文的國家名稱，諸如「日本（*ži ben gurun*）、漢土（*nikan*）、朝鮮（*coohiyan*）、高麗（*solho*）、俄羅斯（*oros gurun*）、滿洲（*manju*）、蒙古（*monggo*）」等地名。⁷⁶此外，他亦記錄下蒙古諸部的滿文寫法，並將「土默特（*tumed*）」用日文音讀為「ツメテ」，並旁注稱「西呼 Tibet」。⁷⁷值得注意的是，高橋試圖將他自滿文文獻輯出的蒙古地名，與歐洲文獻中的亞洲地名進行比較勘同，卻不慎將作為蒙古一部的「土默特」（*tumed*）與荷蘭文中的「西藏」（*Tibet*）混淆，可見其當時對內陸亞洲地名認識仍有模糊之處。

隨著對滿文研究的推進，高橋對其滿文研究有所修正。文化十三年（1816）高橋在《滿字隨筆》的基礎上，擴充纂成《滿文輯韻》。⁷⁸《滿文輯韻》首冊書末附有〈地名箋〉一篇，乃根據《滿字隨筆》所收地名的擴充與深化。通過查閱《漢清文鑑》、《滿漢類書全集》、《三朝實錄》等清朝文獻，高橋在《滿文輯韻》

Press, 2015), 182.

⁷⁴（日）高橋景保，《俄羅斯国エルケウ巡撫贈松前奉行滿文書翰解》（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⁷⁵（日）高橋景保，《滿字隨筆》（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⁷⁶（日）高橋景保，《滿字隨筆》，頁20。

⁷⁷（日）高橋景保，《滿字隨筆》，頁20。

⁷⁸（日）高橋景保，《滿文輯韻》（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中對於清朝統治下的內陸亞洲，較先前有更為清晰的認識。例如《滿文輯韻》明確將土默特改列蒙古諸部條下，並將《滿字隨筆》中「西呼 Tibet」的旁注刪去。此外，〈地名箋〉結尾處新補入「唐古特」(tanggūt)一詞，即西藏的滿文名稱。⁷⁹ 通過比較《滿文輯韻》與《滿字隨筆》等不同時期的著作，可以體現高橋通過滿文研究對內亞認識的推進。

在完成《滿文輯韻》的同一年，高橋又增補兩冊《滿文散語解》作為其附錄。⁸⁰ 不同於作為韻書的《滿文輯韻》，《滿文散語解》主要受到蘭學方法的影響，用以比較探討滿文文法，例如其中在解釋滿文轉折連接詞「udu」(雖然、縱使)的用法時，高橋將其與荷蘭文的「[of]schoon」以及「hoewel」相比擬，⁸¹ 由此可見其治滿洲語學的軌跡，一方面依據漢籍考訂，另一方面亦重視蘭學方法。文政六年(1823)高橋編纂題為《亞歐語鼎》的漢、滿、荷文對照詞書，更是體現其嘗試融通歐亞的治學心態。⁸² 本書雖以漢、滿、荷文為主要詞條，卻亦不時徵引比較俄、英文詞彙，例如在漢文「御前大臣」條下，除依體例列出滿文「gocika amban」以及荷蘭文「kamerheer」(內臣)外，又額外補入英文「chamberlain」(司庫)以資對照。⁸³ 又在漢文「口供」條下，在滿文「jabun」與荷蘭文「antwoord」(答復)外，又增添俄文「otvē」(回復)。⁸⁴

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高橋持續推進滿文研究。文政十年(1827)，他通過將《御製增訂清文鑑》譯為白話漢文，纂成《清文鑑名物語抄》，⁸⁵ 並著手展開《增訂滿文輯韻》的編輯工作，⁸⁶ 展現其縱橫歐亞東西之治學心跡。如《增訂滿文輯韻》補入滿文詞條「salmandara」，對應漢文「撒粹漫大粹」，高橋並進一步以漢文旁注「異獸名。出於熱爾瑪呢亞國，生於陰濕之地，足短身長，黃黑毛雜生。」⁸⁷ 高橋此處關注的「salmandara」，對西文之「salamander」，即歐亞各地傳說中的火

⁷⁹ (日)高橋景保，《滿文輯韻》，卷1，頁39-41。

⁸⁰ (日)高橋景保，《滿文散語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⁸¹ (日)高橋景保，《滿文散語解》，卷1，頁31。

⁸² (日)高橋景保，《亞歐語鼎》(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⁸³ (日)高橋景保，《亞歐語鼎》，卷1，頁43。

⁸⁴ (日)高橋景保，《亞歐語鼎》，卷1，頁63。

⁸⁵ (日)高橋景保，《清文鑑名物語抄》(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⁸⁶ (日)高橋景保，《增訂滿文輯韻》(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⁸⁷ (日)高橋景保，《增訂滿文輯韻》，卷11，頁18。

蝾螈。⁸⁸ 高橋獲取火蝾螈的知識來源，係直接根據收藏於昌平坂學問所的《御製增訂清文鑑》下「salmandara」條清人滿文原注所譯出，其原始滿文內容為：「Ren ma ni ya gurun de tucire gurgu, silmen derbehun bade banjimbi, bethe foholon beye golmin, suwayan sahaliyan funiyehe bederineme banjihabi.」⁸⁹ 如進一步上溯《御製增訂清文鑑》條目之知識來源，則又可推至康熙十三年（1674）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所作《坤輿圖說》。⁹⁰ 要言之，通過鑽研滿文文獻，以高橋為代表的江戶滿洲語學，不僅試圖在方法上橫貫日本漢學與蘭學，比較日、滿、漢、荷、英、俄等不同歐亞語文，更通過考訂清朝滿文書籍，在一定程度擴大江戶日本文化思想界的地理認知與博物知識。

高橋融通日本漢學、清朝考據學及歐洲語文學等多元學術傳統，顯著地推動江戶滿洲語學的發展，惟其於文政十一年（1828）捲入西博多（Siebold）事件，隔年旋即病逝獄中，最終未能如願澈底完成《增訂滿文輯韻》的擴充工作。高橋下獄辭世，無疑對日本的滿洲語學產生重大衝擊。然另一方面，除了身在江戶的高橋之外，十九世紀位在長崎的日本唐通事們，亦曾通過解讀清朝輸出之滿文書籍，試圖學習滿洲語文。承前所述，文化露寇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曾授意長崎的唐通事學習滿文。在此背景下，文化八年（1811）日本方面曾從長崎進口《清文鑑》並授意當地唐通事進行解讀。惟不同於高橋景保對滿洲語文學的研究興趣，長崎唐通事此次對滿文文獻的解讀，最後無疾而終。⁹¹ 根據長崎地方史料，部分唐通事之所以對於學習滿文態度消極，原因在於其當時仍以明末渡海遺民後人自居。⁹²

此後一直要到嘉永三年（1850），長崎的唐通事方才重新開始研究滿文，並完成《翻譯滿語纂編》以及《清文鑑和解》等滿文字書的譯解工作。⁹³ 關於長崎唐通事重拾滿文研究的原因，學者分析認為並非當時的幕府授意，亦不是為了承擔

⁸⁸ Berthold Laufer, "Asbestos and Salamander, an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T'oung Pao* 16, no. 3 (1915): 299-373.

⁸⁹ 《御製增訂清文鑑》（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卷48，頁53。

⁹⁰ （清）南懷仁，《坤輿圖說》，收入《古今圖書集成》，卷525（北京：中華書局，1934），頁16。

⁹¹ 松岡雄太，《長崎唐通事の滿洲語學》（東京：明石書店，2019），頁17-18。

⁹² 松岡雄太，《長崎唐通事の滿洲語學》，頁19。

⁹³ （日）鄭永寧等纂，《翻譯滿語纂編》（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日）鄭永寧等纂，《清文鑑和解》（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

實際的外交公文翻譯，而是藉由參與滿文字書的編譯工作而追求考銓晉升。⁹⁴ 惟不可否認的是，通過譯解《清文鑑》滿文詞條的工作，無疑擴大了長崎唐通事團體對清代中國的認識。據馮璞（又名平野繁十郎，1796-1857）、鄭昌（又名鄭幹輔，1811-1860）及陳勛（又名穎川藤三郎，?-1859）等長崎唐通事於嘉永四年（1851）所識〈《翻譯滿語編纂》序〉，亦可知撰修該書的首要目的，在於通過翻譯促成對清朝的認識，其序稱：「蓋聞滿洲起自北邊一小邦，而疆域漸廣，然未與本朝來往交好，故其國俗典籍，從來渺茫，無人認識，固非重譯，弗克暢通。」⁹⁵ 此處稱日本對滿洲人之陌生，固然有誇飾的成分，卻也反映當時長崎唐通事試圖通過譯解《清文鑑》來加深日本對清朝之認識。

隨著《翻譯滿語編纂》等滿文和譯工作的推進，長崎唐通事們亦留意到滿文對於清朝的重要性，如嘉永七年（1854）馮璞、鄭昌與陳勛等人復稱：「寫讀滿字者，因辨識甚難，而其人殆鮮，書冊亦稀。唯在朝官員，時有用之，故侍帝之左右者，必求學而之，而三品以上官員，不得不知。」⁹⁶ 由此可見，十九世紀後期長崎的唐通事已清楚認識到，相較於漢文的使用者以及出版品而言，滿人以及滿文書籍雖然數量較少，卻因為滿洲人作為清朝統治集團的緣故，滿文在皇帝心腹以及高級官員所組成的政治核心中，仍扮演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然另一方面，唐通事也認識到滿語並非當時中國基層社會所普遍通行的語言。為了解答關於滿語相關的問題，長崎唐通事們曾「詢之清舶來商，欲加研精窮究。眾皆茫然，罔知其所繇，則曰滿人咸來內地學漢。或漢人有言，滿語併知遠，今不能詳述」。⁹⁷ 而十九世紀下半長崎唐通事之所以試圖克服文化障礙以及資訊稀缺，積極學習陌生的滿文，就知識層面而言正是為認識清朝統治核心的文化。由是觀之，即便於道咸之際，滿文在清廷上層的政治作用，仍未被漢文所取代。在此認識基礎上，長崎唐通事以《清文鑑》為核心的滿文字書譯解工作，為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提供進一步認識清朝上層政治文化的資訊渠道。

⁹⁴ 松岡雄太，《長崎唐通事の満洲語学》，頁 220-230。

⁹⁵ 鄭永寧等纂，《翻訳満語纂編》，一上，頁 1。

⁹⁶ 鄭永寧等纂，《翻訳満語纂編》，四上，頁 1。

⁹⁷ 鄭永寧等纂，《翻訳満語纂編》，四上，頁 1-2。

陸、結論

清朝定鼎中國後，江戶日本意外通過清朝經由朝鮮返還之漂流民，得知滿語文詞彙其中對於滿洲騎射的記載，之後進而成為享保年間德川幕府的關注重點。隨著十八世紀盛清在文化與疆域上的發展，滿文字書大量經由唐船輸入長崎；與此同時清朝對黑龍江下游一帶的經略，亦使得日本方面通過山丹貿易得見實體滿文文書。至於清朝與俄羅斯兩大帝國在近世東北亞所形塑的國際政治秩序，更促成十九世紀初期以高橋景保為代表之日本學者以及長崎的唐通事群體，先後投身滿洲語學研究，進而擴充江戶日本文化思想界的地理視野、博物知識乃至清朝認識。要言之，結合內亞與海洋史的視閥，有助於將滿文放置在更為寬廣的歐亞史乃至全球史脈絡，重新檢視清朝與日本間資訊交流之重大歷史意義。

後記

本文係中央研究院關鍵突破種子計畫（編號：AS-GCS-112-H01）、國科會計畫（編號：NSTC 111-2410-H-001-005-MY3）研究成果。本文前期研究階段，曾先後獲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2018）、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日本研究獎（2018-2019）資助，赴京都大學東洋史學專修及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擔任外國人研究員，期間幸得承志、小林亮介、中砂明德、中島樂章等學界前輩協助。本文初稿各節內容曾宣讀於2018年12月9日九州大學舉辦之九州史學會大會，以及2023年6月7日中研院史語所主辦之「由內亞與海洋重訪明清中國」工作坊，承蒙與會諸位先進賜正。謹此致謝。

徵引書目

一、古籍

(一) 中國

-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輯，《正字通》，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
- (清)尤珍，《清書千字文》，收入汪嘯尹纂輯，孫呂吉參註，《千字文註》，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日本正德五年(1715)和刻本。
- (清)尤珍，《清書千字文》，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寫本。
- (清)文慶、賈楨、寶璽等纂輯，《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朱佩章，《朱佩章偶記》，東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
-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清)南懷仁，《坤輿圖說》，收入《古今圖書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34。
- 《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御製增訂清文鑑》，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
-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清朝前期理藩院滿蒙文題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 遼寧省檔案館譯編，《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瀋書社，1984。

(二) 日本

- (日)林復齋，《通航一覽》，東京：國書刊行會，1912。
- (日)鄭永寧等纂，《翻訳滿語纂編》，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
- (日)鄭永寧等纂，《清文鑑和解》，長崎：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本。
- (日)小原克紹，《統長崎實錄大成》，長崎：長崎文獻社，1974。
- (日)國田兵右衛門、宇野与三次郎，《韃靼物語》，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天明七年(1787)抄本。
- (日)高橋景保，《魯西亞國呈書滿文訓訳強解》，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高橋景保，《滿文輯韻》，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 (日)高橋景保，《滿文散語解》，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 (日)高橋景保，《滿字隨筆》，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 (日)高橋景保，《增訂滿文輯韻》，京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附屬圖書館藏本。
- (日)高橋景保，《清文鑑名物語鈔》，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 高橋景保,《俄羅斯国エルケウ巡撫贈松前奉行滿文書翰解》,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 高橋景保,《亜歐語鼎》,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 近藤守重,《辺要分界図考》,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 間宮林藏,《北夷分界餘話》,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 間宮林藏,《東韃地方紀行》,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
- (日) 荻生總七郎、(清) 朱佩章,《清朝探事》,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
- (日) 荻生徂徠,《滿字考》,收入南畝子輯,《群書一轂》,第 3 冊,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日本天明元年(1781)抄本。
- (日) 荻生徂徠,《滿字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 《對語驥録》,收入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二:朱氏三兄弟集》,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95。
- 《唐馬乘方聞書》,收入大庭脩編,《享保時代の日中關係資料二:朱氏三兄弟集》,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95。
- 《カラフトナヨロ惣乙名文書》,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館藏本。

(三) 朝鮮

- (朝鮮) 崔益鉉,《勉菴先生文集》,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四) 其他

von Langsdorff, G. H. *Voyages and Travel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During the Years 1803, 1804, 1805, 1806, and 1807*. London: Henry Colburn, 1813-1814.

二、專書著作

(一) 中文

- 大庭脩、王曉秋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歷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1。
- 陳國棟,《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 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14。

(二) 日文

- 上原久，《高橋景保の研究》，東京：講談社，1977。
- 大石学，《吉宗と享保の改革》，東京：東京堂，2001。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
- 古瀬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東京：吉川弘文館，2018。
- 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年》，東京：創文社，1987。
-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6。
- 仲光亮，《日本江戸幕府蒐集中國情報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7。
- 池田皓，《漂民の記録：極限下の人間ドラマ》，東京：講談社，1969。
- 松岡雄太，《長崎唐通事の満洲語学》，東京：明石書店，2019。
-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
-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16。
- 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
- 眞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昌平坂学問所儒者と幕末外交変容》，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
- 程永超，《華夷変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関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2021。
- 園田一亀，《韃靼漂流記の研究》，奉天：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1939。
- 園田一亀編，《韃靼漂流記》，東京：平凡社，1991。
- 新村出，《東方言語史叢考》，東京：岩波書店，1927。

(三) 英文

- Afinogenov, Gregory. *Spies and Scholars: Chinese Secrets and Imperial Russia's Quest for World Power*.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 Clements, Rebekah. *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Monahan, Erika. *The Merchants of Siberia: 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6.
- Po, Ronald C.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Schlesinger, Jonathan. *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 Toby, Ronald P.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alker, Brett L. *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Japanese Expansion, 1590-18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三、期刊論文

(一) 中文

- 孔令偉，〈1724-1768 年間拉達克、西藏與清廷間的歐亞情報網——以清代中國對莫臥兒帝國的認識起源為核心〉，《清史研究》，第 2 期（2018），頁 27-48。
- 孔令偉，〈日本、日耳曼的滿語文研究與近世歐亞〉，《讀書》，第 5 期（2019），頁 160-170。
- 徐興慶，〈長崎港與近世中國文化之受容〉，《海港都市研究》，第 1 編（2006），頁 21-32。
- 馬騰，〈「十二字頭」與清代滿文語學〉，《清史研究》，第 3 期（2014），頁 1-11。
- 陳波，〈清朝與日本之間的情報搜集——以清朝入關前後為中心〉，《江海學刊》，第 4 期（2014），頁 147-155。
- 陳國棟，〈清代前期（1644-1842）海洋貿易的形成〉，《大陸雜誌》，第 64 卷第 2 期（1982），頁 21-35。
- 黃彰健，〈滿洲國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下冊（1967），頁 459-473。
- 楠木賢道著、阿拉騰譯，〈江戶時代享保年間日本有關清朝及滿語研究〉，《滿語研究》，第 1 期（2013），頁 75-83。
- 劉序楓，〈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故宮學術季刊》，第 39 卷第 4 期（2022），頁 123-171。
- 盧正恒，〈賊諜四出廣招徠：鄭氏諜報網、清帝國初期的東南海島認識與《臺灣略圖》〉，《臺灣史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19），頁 1-58。
- 賴惠敏，〈清代烏梁海的貢貂與商貿活動〉，《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 期（2019），頁 9-17。
- 薛明，〈清入關前的對日認識〉，《清史研究》，第 2 期（2012），頁 43-54。
- 關嘉祿、佟永功，〈清朝貢貂賞烏林制度的確立及演變〉，《歷史檔案》，第 3 期（1986），頁 93-98。

(二) 日文

-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354-390。
- 佐々木史郎，〈18、19 世紀におけるアムール川下流域の住民の交易活動〉，『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22 卷第 4 號（1998），頁 683-763。
- 松岡雄太，〈『翻譯滿語纂編』と『清文鑑和解』の編纂過程〉，『長崎外大論叢』，第 17 號（2013），頁 61-80。
- 上原久，〈「滿字考」について〉，『埼玉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篇』，第 37 編（1988），頁 1-9。
- 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滿州文〉，『北方文化研究』，第 3 編（1968），頁 179-196。

(三) 英文

- Laufer, Berthold. "Asbestos and Salamander, an Essay in Chinese and Hellenistic Folk-Lore." *T'oung Pao* 16, no. 3 (1915): 299-373.
- Walker, Brett L. "Reappraising the Sakoku Paradigm: The Ezo Trade and the Extension of Tokugawa Political Space into Hokkaido."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0, no. 2 (1996): 169-192.

四、專書論文

- 沈玉慧，〈從對日情報蒐集與運用分析清朝對日政策〉，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143-178。

五、學位論文

(一) 中文

- 楊義騰，〈《正字通》與歷代重要字書之比較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3。

(二) 英文

- Kung, Ling Wei.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etween Early Modern China, Inner Asia, and Eurasia, 1621-1911."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olumbia, 2021.

（責任編輯：陳柏諭）